

一块钱,凑上买了,会卖完的!而此时的张父,已经连咸菜都吃不上!

读书的最佳之地何处?书房是也!通过书中文章,倒是了解了不少大家的书房故事。

那年筹备结婚之前,隐地的准岳母曾把“酒柜”列入女儿的嫁妆之中,而隐地则把酒柜换成了书橱,然而,他又开始羡慕起人家家里的“书墙”来了,后来买了新房子,就把书架沿着墙壁建在客厅里。每一个到他们家的朋友,都会不约而同地惊叹着,“哦,好多的书,好大的书架,像是走进了书店!”在书的世界里徜徉,该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打开一本书,你就会进入一个世界,波澜的、平静的、繁华的、简陋的……它能激昂我们生的意志,毫无痛楚地弥补了现实生活的缺陷,使我们精神升华,改变气质,帮助你我开阔心胸、拓展视野,而不再只想到凡俗的日子……

我想,隐地先生在那样别致的客厅里读书,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那是读书人的天堂!

陈铭礪年幼的时候,全家十口人挤在狭巷中的小木屋内,即使是在拥挤不堪的生存环境中,他还是给自己布置了一块书的天地:

把一张桌子锯去四角的三分之二,危危岌岌地搬上半阁楼,然后在不及两米见方的壁上,贴满格言、画片,又在那张“不健康”的桌子旁,挤进一个大概只有一米高的书架。盘膝坐在书桌前,头已快顶瓦檐了。

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他依然感到满足、自在,自得其乐地听雨声,看流云。多年之后,当陈铭礪终于可以拥有自

己的书架——“一面好大好大墙壁的书架”时,欣喜得彻夜难眠。爱书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读书、看书,对于读书人而言的另一个乐趣,大概应该是来自买书。

上海作家韦决的《访书》,乐此不疲地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寻寻觅觅,踏遍可以一访的旧书店,不管它是隐没在石库门弄堂的深处,还是商厦的楼上,哪怕是十来平方米的局促之屋,都不妨碍他获得访书的乐趣,在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人生。青岛作家薛原则不同,他不喜欢淘那些蓬头垢面的旧书,而喜欢在降价书市中“轧闹猛”,碰到五折、四折、三折的“旧书”,常常满载而归。其中的乐趣,不言而喻,这恐怕也是读书人共同的雅癖吧!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理事长曾祥芹教授很赞赏“悦读”这个理念,他认为:

把同音的“阅”字换成“悦”字,着意营造读者的良好心境,使“阅读”活动变成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审美愉悦,使单纯的“阅读”技术升华为充满人文精神的“悦读”情怀,其内涵确实深厚得多,高雅得多。

把曾祥芹的这篇《在“悦读”中享受人生》作为全书的结尾之篇,是有点意思的。他提倡树立“快乐阅读”的“时空一体观”,“悦读无限的大阅读观”,要求每个现代的合格读者借助文字媒介,去感受“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的外宇宙。

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阅读成为一种姿态,当“悦读”成为一种人生的需求和精神上的渴望,让我们就马上行动起来,从今往后,由“阅读”而“悦读”吧!

·观书记·

戈宝权先生收藏的《托尔斯泰全集》

秋 禾

仅印行了一千册的《戈宝权纪念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中,收录有戈氏夫人梁培兰所写《戈宝权与托尔斯泰全集》一文。其中说,1935年戈宝权作为记者在莫斯科生活的三年中,得以参加有关的各种纪念活动,瞻仰了其

纪念馆,凭吊了墓地,访问了其故乡,阅读了他的名作,从此就有了订购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纪念版90卷本的志向。

戈宝权(1913年2月15日—2000年5月15日)在《托尔斯泰全集》首卷扉页上题跋道:

苏联自 1928 年托尔斯泰诞辰百年纪念时起,开始编印纪念版的《托尔斯泰全集》。经过 30 年之久,方于 1958 年出齐,共 90 卷。忆当时苏联曾有过一张漫画,称一家经祖父、父亲和孙子三代之努力,方将全集购齐。《托尔斯泰全集》印数不多,每卷一般不过 5000 册。因此在苏联旧书店中也早已成为难得之书。我从 30 年代开始搜购,经多方面努力方补成全集。四十多年来,我先从莫斯科将此书运回,后几经迁徙,又复经“十年浩劫”及地震之灾,全书得保存至今,亦云幸矣……(《戈宝权纪念文集》,第 68—69 页)

此一情节尚有续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廷桦先生在《我心目中的戈老》中说:

戈老曾经说过:“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他购书、藏书、读书、爱书,视书籍如生命。先生生活简朴,屋内都是 50 年代的家具,老式书柜里摆满了书。书是先生仅有的财富。曾听戈先生的夫人梁培兰女士谈过,先生出国访问,空余时间大都是上街买书,特别是在苏联,书价便宜,先生选书购书,如痴如狂,常常弄得囊空如洗。回国时行李中,除书之外,别无他物。有时六七个书箱,大大超重,坐不得飞机,只好改乘火车。“文革”期间,先生身在牛棚,心系藏书,想方设法保护珍贵图书。接受“改造”时,每月 25 元的生活费,仍忍不住要省下钱来买书。(《戈宝权纪念文集》,第 352—353 页)

戈宝权先生毕生藏书至两万余册,以“万卷书斋”命名,于 1986 年全部捐献给了南京图书馆,该馆为此设有专门的“戈宝权藏书室”。据说当一并捐献的《托尔斯泰全集》清点时,竟不知何时已佚失了一册,成为重大遗憾。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倪蕊琴教授捐出所藏那一册,使之终成全璧。

《戈宝权纪念文集》还收录有南京图书馆研究员邵延森先生所写《戈宝权藏书室“建立的前前后后”》,回忆其接收捐赠前至北京东罗圈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前往接洽情形,述其中多有郭沫若、巴金等中国知名作家,以及法捷耶夫、爱伦堡等签名本,他认为:“这些中外作家大多作古了,这些亲笔签名的著述本则愈显珍贵了,可算是新善本”。

又有南京图书馆研究员纪维周先生所作《记戈宝权“万卷书斋”藏书》,其中说:

1935 年春,戈宝权在莫斯科,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据他挚友冒效鲁回忆,戈宝权已是爱书成癖

了……经常与耿济之、戈宝权到旧书店购俄国文学书籍。据说,那时买书要自己登上梯子爬到天花板下书架上搜寻,有时又要趴在地上在书架底下搜罗……在他收藏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艺书中,有不少毛边本,至今完整无损。而且在书的后页空白处,用清秀的字体注明书的来历,有不少书还记载着什么入寄赠给他的。

据纪文披露:“戈宝权的藏书极为珍贵,北京有某学术单位要高价收购他的藏书,但他未予同意。因为他是江苏东台人,为了热爱家乡,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珍藏赠送给江苏省。”前辈人文风范,尽是在举矣。

至于其如何“经多方面努力”搜购,又怎样“几经迁徙”,戈氏题跋中语焉不详,章教授在文章中却有所披露。大抵“几十年如一日,克服一切困难,在苏联作协、苏中友协、驻华使馆及俄苏学术界友人的帮助下,一本又一本,一卷又一卷地积攒,终在 1958 年购齐 90 卷(有的卷分成两三本),1962 年苏又出一本 90 卷全集的目录索引,先生购得过后全套共 91 卷。这是国内惟一的一套弥足珍贵的原版全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戈宝权先生在《我的“万卷书斋”》中,自述其苏联访书经历时说:

在莫斯科工作的三年当中,我经常到高尔基大街、艺术剧院街、铁匠桥和阿尔巴特大街一带的新旧书店去买书,特别是搜购旧书。买书的人都知道,旧书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我竟然搜购到了不少难得的书,主要是俄国古典作家的文集,研究他们的论著,以及回忆他们的稀有珍本书……据近几年在莫斯科的旧书店打听,(《托尔斯泰全集》)这套书现在已贵到三千卢布,即使出这个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我搜购到了不少研究普希金的论著,还买到了托尔斯泰夫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写的有关他们丈夫的回忆录和日记等难得的书……我当时不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搜购书籍,还托过王礼锡从伦敦的福伊尔旧书店购买在英国出版的与俄国文学有关的书,其中就有莫德著作的《托尔斯泰传》等书。

《我的“万卷书斋”》收录在姜德明先生征稿并编辑,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书香集》之中。遗憾的是,《戈宝权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未将这篇与其藏书有着极大关系的文章附收于本集中。

(2007 年 3 月 11 日夜于金陵江淮雁斋)